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各级纪委要解决好『灯下黑』问题

□ 贺海峰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各级纪委要解决好“灯下黑”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这个问题要探索解决。

“灯下黑”，原意指灯具在照明时，由于自身的物理遮挡，在灯具下产生了黑影，由此引申为权力行使者在对自身及“身边人”进行监督时容易出现监督“盲区”。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利器重器作用，但少数纪检监察干部仍然存在目无法纪、以案谋私、跑风漏气等问题，侵蚀了党的肌体、破坏了党的形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灯下黑”比喻“谁来监督纪委”的难题，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马克思主义手电筒既照别人更照自己，不能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在少数纪检监察机关中之所以出现“灯下黑”问题，既有一般消极腐败的共性成因，又有其自身独特的发生机理。物理光学原理认为，光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而在不能照射的区域就会形成黑影。在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处于聚光灯下的“老虎”“苍蝇”引起了广泛关注，而灯光照射不到的“蛀虫”“内鬼”则很容易被人们忽

视。纪检监察机关在党的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拥有监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等“治权之权”，并且监督领域和对象点多、线长、面广，工作保密性和专业性都很强。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精力投入不足等原因，可能会对自身的问题习焉不察，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从目前出现的“灯下黑”案件看，少数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纪律和规矩意识不强，不习惯被监督，摆架子、耍威风，甚至经受不住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以权谋私、以案谋私，由执纪监督者堕落为腐败分子；也有极少数纪检监察机关对“灯下黑”问题视而不见，畏首畏尾，不敢动真碰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同其他消极腐败相比，“灯下黑”看似面不大，危害却不容小觑，更具特殊性、顽固性和反复性，防治难度也更大。可以说，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如果在作风和纪律上偏出一尺，反腐败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就会偏出一丈。

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科技的发展，解决“灯下黑”也有很多办法，例如外科手术中使用的无影灯，采用多个灯泡有序排列，就能形成没有阴影的大面积光圈。坚决防治各级纪委“灯下黑”问题，也要针对具体问题和不同情形，丰富“工具箱”、打好“组合拳”，形成强大合力，实现最佳效果。一是检视自身，排毒杀菌。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对“灯下黑”现象零容忍，一旦发现问题，必须严肃查处并公开通报处理结果。通过及时打扫庭院、坚决清理门户，释放一严到底、无死角无禁区的强烈信号，不断巩固“不敢腐”的惩治震慑，有力维护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纯洁。二是增设“光源”，全面监督。党和国家制定出台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监察法等，为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党中央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开展巡视；纪检监察机关成立干部监督室，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健全打探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离岗报备、“八小时外”重大情况报告等制度。同时，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通，切实防范权力任性脱轨。三是增强“亮度”，立根固本。纪检监察机关要高举“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警示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铁的信仰、铁的纪律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铁军。纪检监察干部必须点亮理想信念的“长明灯”，时刻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秉公执纪、谨慎用权，在攻坚战持久战中始终冲锋在最前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要“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加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惟其如此，才能让“灯下黑”无所遁形、无处藏身，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学术要不求名利，不走极端

——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治学之道

□ 苏金智



从1916年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中国语言的问题》到1979年出版《通字方案》，赵元任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为提高我国国民语言能力殚精竭虑。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以提高国民语言能力为己任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当时，赵元任等人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长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剥夺了广大民众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中华民族共同语的统一、规范与推广，国语罗马字的制定，文字改革这几件大事与白话文运动可以相互配合，是新文化运动与民众切身利益关系最为紧

密，也是民众最为关注的大事。

其实早在1916年，赵元任就在《中国语言的问题》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每个国民应该掌握四千到五个常用词，能读懂书面语并能应用，除了能讲当地的方言外还要能讲共同语，但极少数国人能达到这种要求。因此，要改变现状，一方面要加强中国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要进行建设性的改革。赵元任希望通过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国民语言能力，使广大民众摆脱文盲状态，让中华民族共同语及其文字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建设新文化。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践行自己的主张。

赵元任参加了当时国语统一和推广的各种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对中华民族共同语和各地方言进行了科学研究，推动了共同语的规范标准制定和国内外传播。同时，在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定、为新诗谱曲和新音乐的创作等方面，他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与胡适是好友，赵元任曾表示胡适的白话文写得不够“白”，胡适的白话文实际上文白夹杂，并没有做到胡适自己提倡的“我手写我口”。而赵元任长时间坚持用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写作，创作新诗、做翻译工作等，身体力行影响着国民提高听说读写语言能力。

语言文字的重大变革不仅直接关

系到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命脉和文化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共同语标准的确立和推广、汉字的简化，大大推动了国家普及教育和现代化进程，促进了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在国语罗马字等拼音方案基础上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国内外中文学习者的重要辅助工具。今天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赵元任等新文化运动进步人士的研究和奉献密不可分。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赵元任从小兴趣广泛，尤其痴迷于语言学习。后来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保持着对语言和音乐的爱好，挤出时间学习世界多种语言和中国各种方言，学习音乐知识并进行歌曲创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其中《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广为流传，为我国现代音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在系统掌握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知识之后专攻语言学，首开我国系统科学调查汉语方言的先河，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实事求是，是赵元任从事学术研

究科学精神的核心。“言有易，言无难”是赵元任给其高足王力在清华国学院撰写的研究论文的批语。这一批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要符合语言事实，在没有全面深入调查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语言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有大量的语言调查材料支持。

中国历史上有文人做过一些语言调查，但由于缺乏科学记音手段，很难如实记录语言的语音面貌。赵元任则用现代语音学符号和现代语音分析工具，调查记录和分析了汉语方言的语音结构。从1927年开始，他计划开展全国性的方言调查。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音组主任后，建立了大型的语音实验室。从1928年起，他先后开展了两广方言调查、徽州所属六县方言调查、江西省56处方言调查、湖南方言调查、湖北方言调查。这些调查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也为了解当时的语言国情、制定科学的语言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赵元任在调查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还注重用科学的方法细致分析语音结构，揭示汉语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的结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五度值标调法就是赵元任开创的用数字标调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大量调查和实验研究过程中，在记录调值时把声调曲线画在音乐五线谱图

造福世界惠及全球的伟大事业

——读习近平总书记《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田书为

挑战频发的世界需要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我们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需要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推动各方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变革调整的时代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条件。习近平总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为同心协力、凝聚共识，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条件。

深刻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

化为现实。丰硕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已然绘就了一幅“大写意”。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作出了深刻阐述。

“一带一路”倡议继承和发扬了丝路精神。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沿着古丝绸之路，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习近平总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习近平总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我们强调共建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和项目对接；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各国的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切实提升了有关国家的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拓展新实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为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不断夯实发展根基，合力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展开深刻论述，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十年来，中国已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证明了“一带一路”顺潮流、得民心、惠民生、利天下。展望未来，我们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习近平总指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助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等，让“一带一路”继续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学人小传

赵元任（1892—1982年）：生于天津，原籍江苏常州，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曾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代表作有《现代英语的研究》《中国语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

上产生的。赵元任用七弦琴做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再用画格子临法帖的办法，按原样改画到一般的五线谱上面，形成五度值标调法的雏形。1930年赵元任在国际语音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一套标调的字母》，正式提出了五度值标调法。这一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对各种声调调值的描写、分析和研究中。现在普通话的标调，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主张不同文化要相互学习

赵元任学识中西，具有多语转换能力。他活跃在国际语言学界，是拥有学术话语权的领军人物。他还与国际上许多其他学科的顶级学者有过学术交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其成功经验除了语言天赋、后天的多语转换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有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是在痴迷中华语言文化的同时，也热爱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化；二是有献身学术的精神，不为名利所动；三是具有海纳百川、包容持中的伟大胸怀。

赵元任热爱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化，他主张不同文化要相互学习、和谐相处。当然，他也反对对中国语言

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士随便发议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说三道四”。他批驳过西方人士有关汉语语法缺少形式主语导致中国人缺少考察客观物质能力的谬论，以及对中国音乐无知而瞧不起中国民族音乐的西方人士。

赵元任献身学术研究，不求名利，在学术上不走极端，具有博采众长、变通包容的胸怀，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勇气，淳朴稳健、取和持中的学风。他曾用数学函数概念来阐释古人持中学说的合理性：中国自古以来就讲中庸之道，古希腊人也喜欢讲凡事要有节制，亚里士多德也有持中的说法。所谓中不一定是正当中。如果把最大值看成是最佳点，那么最佳点可能在两头，也可能在中间，如果中庸的中字不限于正当中，只要不在两端就叫“中”，那么从统计概率上看中间当然居多，两端居少，中庸在算学上是有根据的。赵元任更是把中外哲人的持中思想运用到治学之中，不轻易否定别人的观点，古今中外不同方法他都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这也是他一系列研究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并且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